

郑观应的国债思想

卢文莹

郑观应是接受西方思想较多的一个人。他在经办洋务的过程中,对西方的国债及思想较为熟悉了解。认为在国用不敷时,即可向本国人民,也可向外国商人举债,这是西方各国的惯例。对于举债的方式,应按西方惯例,且应全盘统筹,周详审慎。

郑观应(1842—1921)是买办出身的洋务企业经营家,又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。他十七岁从广东来到上海,先后从师叔父郑秀山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语。他曾经担任英商宝顺洋行买办、太古轮船公司经理,投资经营茶栈和中外合营的轮船公司等。他同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,对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有一定的感性认识。他和李鸿章、盛宣怀等人一样,都是洋务运动中比较关键的人物。他们的共同点是涉及面广、活动时间长。对他的国债思想进行探讨,可以以点带面,有助于了解我国近代的国债思想。

一、“国债”存在的必要性

郑观应是接受西方思想较多的一个人。他在经办洋务的过程中,对西方的国债及其思想比较熟悉了解。他借鉴西方国债经验教训,在光绪六年(1880)出版的《易言》中即有《论借款》一文,^①光绪二十年(1894)出版的《盛世危言》中,又以《国债》为题论述了国债问题,两者措词有所不同,但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。在《国债》的一开头,就引证了西方各国的情况,郑观应写道“泰西各国无不有国债,凡由议院公议准借者,其国虽为别人所得,仍须照还。故各国兴大役,出大军,国用不敷即向民间告贷,动辄数千百万,或每年给息,或按年拨本。君民上下,缓急相济,有相通,隐寓藏富于民之义,而实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。”^②认为国债之举不至于公私坐困,而且上下相益,既可以损有余补上之不足,而且可以“王令朝颁,军需夕至。闾阎之富无殊国帑之充,是民即以足国,其便一也”。^③每岁所征之税,用以一部分还息,则可保证有内债借,正如《易》中所说:“损上益下”,“其道大光”,对国家无害。郑观应认为,如果这样,就可以做到“利不出一方,而财不资乎异地”。^④从以往的情况看,这可谓最好的办法。但在国用不敷时,既可向本国人民,也可向外国商人举债,这也是西方各国的惯例。郑观应认为,中国本无“国债”一说,自同治六年(1867年)左宗棠西征款,才是借洋债之开端。他说:“中国自同治六年间,左相伯以西征需饷,始借洋债,系沪上(英国)银行经理,由八厘至一分五厘行息,将各海关洋税收拨抵,分年本利清还”。^⑤郑观应并不反对正常的借债,但他反对以海关作抵,并且认为在一般情况下,借外债不如借内债。“万一贷之于民,而缺仍有不足,始可酌以微息转贷邻封”。^⑥他还认为前时中国息借洋款,以海关作抵,是将绝大利权让给外国,中国量入为出,本有常经,时借债外洋,权应一时之用。加以“金镑高下,既受巨亏”。所以如果用海关作抵,他建议“嗣后洋债一端,自应永行停止”。^⑦

但郑观应认为,如果息微量少,无其它苛刻条件,能“将以前流弊,一扫而空”,未尝不可借

外债,而且一般而言,外国借贷资本的利息比国内要低,利用外资有现实的可能性。他曾分析说:“考英、法、德、美诸国,借贷行息三厘,多不过四、五厘而已。若土耳其、波斯等国,则国欠债过重,行息过多,致利权授于他人,国势寝形微弱,中国幅员之广,矿产之饶,远胜泰西,人所共悉。人款劳动甚多,而借债甚少,无须重息可贷多金。闻中国借券之股份,中外人争购之,每股九十五镑有涨至一百零四五镑者。外国之债股份分单时有涨跌,即俄国之钞票亦有涨跌也。由是观之,中国虽少出子金,仍能应手”。⑧

二、借内债优于借外债

郑观应在法越战争时,为了筹办粤东海防需饷曾条陈当局,请求仿照西人之法筹借民款,建议由各海关银号出票,按年清理。其票据可抵关税钱粮捐纳之需,数目无折扣,成色无高低,愿意提供借款者数额高达百万之家,当局给予优待,善为保护,不借端勒捐,以示体恤。这样一来,民间踊跃乐从。在郑观应看来,取信于民是借债的主要条件。他说:“夫财犹水也,惟患其雍塞,不患其流通。上下交征则败国亡家之券也,上下相济则亲上死长之心也。苟能示以大公,持以大信,试借民债以给度支,成一时济变之良规,即以葆万世无疆之盛业。较前日之开捐例以鬻爵,借洋债以损国,设厘卡以病民,其利弊得失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”。⑨他称赞英法两国政府取信于民的国债政策。“昔英国政府国库帑充溢。欲将国债全数扫清,而英之富民咸谓:‘存之于家不若存之于国。’……法之国债每年交银息六千万两,可谓巨矣。而民间尚肯贷之者,则以政府尚信,足以取信于民,而民亦以按年可以得息,较之他处为稳也。或谓一千八百七十年,即同治九年,法国为德灭矣。若宗社为墟,国债将准索乎?不知万国公法,国之债贷于民,还债之项出于地,债与地合而为一,其地为谁有,则其债应谁偿,此民之所稔,所次无虑也”。⑩

三、举债的方式与用途

郑观应认为,举借外债应按西方惯例。他接受了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建议,提出中国举债应采取以下方法:首先,筹措洋款应向英国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筹商。因为这两个银行是国际上公认的银行,素有名望,人人信服,常能以微息借巨资,这是别的银行所不及的。其次,借款限定早日一次全还。再次,按结归还,在债券上载明:每结归还若干,第二,第三结归还若干,“俾得早为料理,彼放债者亦乐闻。”⑪以上主要是谈了借债的方法。对于借债的用途,他仍采纳了驻英大使的建议。大使谈到:“放债者乐闻某国借钱建造铁路、电线、开矿、治河一切富国之业,以其出息大而券票强,甚不愿出资以作耗财事。尤恶借银以用兵装,银钱变作火药、弹丸、散于枪炮之口不能复返,则债主不但失利,成本将亏”。⑫郑观应认为驻英大使的话很正确,应该加以注意借鉴。

郑观应主张借外债须全盘统筹,周详审慎,不必托中国银行经手,以免辗转图利。建议直接交涉中国驻英大使,直接向英国劳士、斋乃德博令等大银行熟商,行息不过五六厘,“中国素来守信,洋人自必乐从”。⑬而且认为,借自英、俄、法等国,不如借美国,借数十亿不如借数百亿;借镑数不如借银数。因为英、法、俄属地与中国毗连,时常有外交上矛盾,容易被其挟持。如果借自美国,则无此顾虑。并且借债的数额越大越容易取得低息借款。借数十亿,利息须四厘到六七厘。借数百亿,利息不过三厘。借镑数不如借银数,因镑价已提高,似有跌而无涨之势,不如银借银还,以免重陷以前镑亏的复辙。郑观应闻美国公使说,美国富商肯借银300兆给中国,利息三厘,且以银借银还,准分三、四十年清还,认为时机不可错过,即可以还各国(下转第25页)

评判营销目标的实现程度。但是在实践过程中,银行的营销目标往往是多元、多层次的,而非一元,单层次的。因此,往往需要全面地评估营销业绩。

评估银行营销业绩,一方面要兼顾直接营销业绩(市场及销售发展)与间接营销业绩(财务效益),另一方面还要兼顾总体业绩与各层次、各部门及乃至各营销人员(如柜台营业员)个别的营销业绩。直接营销业绩评估,可采用销售实绩与销售计划的对比,实际市场占有率与预期市场占有率的对比等方法。同时,也应尽量结合竞争对手销售情况及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析。间接营销业绩的评估,宜采用财务比率分析方法。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选取适当的财务比率。有些同志认为销售利润率是一个较好的指标,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资本利润率方能体现间接营销业绩,即财务效益。我们认为,一般情况下宜采用资产报酬率指标。这是因为,销售利润率指标虽能较好地反映银行实现利润与总销售额之百分比,但它不能体现为实现一定水平的销售额所付出的代价——资产投入的大小。资本利润率指标,虽从业主(股东)角度来看是最有意义的,但这个指标值的高低,除了取决于销售利润率的资产周转率外,还取决于企业资金结构——资本占总资产的百分比。而资金结构状况,是财务安排的结果,与营销工作没有直接联系。资产报酬率指标,则能很好地反映营销工作的综合业绩——投入产出水平。

银行营销业绩的总体评估,除了利用上述指标进行“量”的分析之外,还应该通过对顾客意见的追踪调查及定期问卷调查等方式,从“质”的方面作出评估。这些调查的结果及其分析,将能反映银行过去的营销工作满足顾客的程度,以及银行在顾客心目中的总体形象。这种“质”的评估结论与“量”的评估结论若有较大不符,则很可能预示着银行今后“量”的营销业绩将出现滑坡。这种情况尤应给予重视。最后,对各层次、各部门乃至各营销人员的业绩评估,也应尽可能从“量”和“质”两个方面作出全面评估。

责任编辑 首之

(上接第70页)重利之款,又可得此巨款,以使百废俱兴。同时仿照俄、日引进国外的人才,参与中国的洋务运动。这种引进外资和人才的作法,对后人影响较大,孙中山先生在谈到利用外资的原则时就有这一条。

注释:

①《易言》三十六卷本中篇名为“论国债”、二十卷本为“国债”与“盛世危言”中篇名相同。

②《盛世危言·国债》,夏东元主编《郑观应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。

③、④《盛世危言》附录《俄国出入度支总数考》,夏东元主编《郑观应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0页。

⑤《易言·证借款》卷三。

⑥《盛世危言·国债》初编,卷五。

⑦《盛世危言·国债》夏东元主编《郑观应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。

⑧《盛世危言·国债》,夏东元主编《郑观应集》上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页。

⑨、⑩同上书,第581—582页。

⑪同上书,第582—583页。

⑫《易言·国债》上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—162页。

⑬《易言·国债》第199—200页。

责任编辑 首之